

# 依边而生:尼泊尔利米人 及其中尼边境贸易生活研究\*

李志农 邬迪

**内容提要** 尼泊尔利米谷地与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接壤,跨境贸易历史悠久。利米人与我国藏族同源,历史上王系的频繁更迭,致使其在归属问题上错综复杂。根据1961年的《中尼边界条约》,利米地区划归尼泊尔管辖。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的政策背景下,尼泊尔利米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兴边富民”政策的受益者、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关注利米人及其中尼边境贸易生活,对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尼泊尔 利米人 边境贸易 周边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

中尼边境贸易历史悠久,是西藏与南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线上,共有六个中尼口岸<sup>①</sup>。其中,普兰口岸位于中、尼、印三国交界处,是中尼、中印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自1992年普兰口岸重新开放以来,<sup>②</sup>三国的许多边民受到吸引,积极参与边贸活动,对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尼泊尔的利米人依边而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利米人都是中尼边境贸易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尼跨国贸易中有代表性的经营者。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兴边富民”战略的推进,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山谷地带的利米人与我国的关系愈加密切。在边贸活动中,尼泊尔利米人主动融入和参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两国边民形成了良好和积极的互动关系,生动地诠释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此,以尼泊尔利米人及其边境贸易活动为案例,研究其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对推进我国西藏与尼泊尔等国的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建设南亚通道,开展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sup>③</sup>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米位于尼泊尔西北部的卡尔纳利省(Karnali)胡木拉县(Humla)南卡(Namkha)乡村自治第六区,与我国西藏阿里普兰县接壤,是一个跨喜马拉雅山脉的谷地,四周崇山峻岭环绕,平均海拔3800米左右,面积约为1200平方公里。谷地的居民为藏裔民族,操藏语普兰方言,分布在瓦尔则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尼泊尔中国海外藏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18VJX09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专家和《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这六个口岸分别是位于普兰县的普兰口岸、吉隆县的吉隆口岸、仲巴县的里孜口岸、聂拉木县的樟木口岸、定结县的日屋口岸和陈塘口岸。

② 普兰口岸于1954年设立开放,1962年关闭,1992年重新开放。

③ 《习近平会见尼泊尔总统班达里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9年10月13日,第1版。

(Waltse)、臧(Zang)、涕尔(Til)<sup>①</sup>三个村庄里,每个村庄之间的步行距离为 2 小时左右。根据 1991 年的尼泊尔人口普查报告,利米共有 169 户家庭,988 人。<sup>②</sup>截至目前,很难计算出利米的准确人口数量。据村民的不完全统计,利米人应当不少于 1500 人。<sup>③</sup>

在学界最早关注利米人的主要是西方学者。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就开始关注并撰写多篇论文介绍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利米人,研究主题涉及利米的高山生态状况、<sup>④</sup>半农半牧的适应性生计、<sup>⑤</sup>“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sup>⑥</sup>及生育状况<sup>⑦</sup>等。此后关于利米人的研究较少,直到 21 世纪后,利米才重新回到西方学者的视线中,研究选题涵盖广泛。马丁·萨克瑟详细介绍了尼泊尔公共卫生、野生动物保护和社区林业三项政策的实施给胡木拉利米社区的生活、经济等方面带来的影响。<sup>⑧</sup>阿斯特里德·霍夫登在利米社区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民族志研究,她的博士论文探讨了利米社区与寺庙的关系及影响问题。<sup>⑨</sup>此外,她还著文论述了利米社区成员与寺庙供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sup>⑩</sup>叶婷使用“土地属于尼泊尔,人民属于西藏”的叙述分析了利米人“主权归属”的重叠与流动的状况。<sup>⑪</sup>希尔德加·德登贝格和萨曼塔·斯克里韦探讨了环境退化下利米山谷的塑料和其他垃圾污染问题。<sup>⑫</sup>塔拉·贝特从性别关系和动态景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利米牧民实践中的“驯化”概念。<sup>⑬</sup>这些研究文献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利米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知识和背景。

在我国学界,对利米人的关注不多。21 世纪初,学者坚赞才旦曾将梅·戈尔斯坦关于利米人

① 目前学界对利米三个村庄的英译和汉译并没有明确的统一,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在早期的论文中,将村名翻译为 Tsang (mdzang)、Alzhi(wa rtse)、Til(til)。我国学者坚赞才旦将村庄译为察安、阿尔之和涕尔。阿斯特里德·霍夫登将其译为 Dzang、Halji、Til;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叶婷译为 Dzang、Waltse、Til。本文根据利米当地人的说法及其藏文发音,将村名翻译为瓦尔则(Waltse, འོ་ཤར་ཅོ་ལོ་),臧(Zang, མཛུང་ཅོ་ལོ་),涕尔(Til, ཏི་ལོ་)。

② 数据根据 1991 年尼泊尔人口普查结果,通过数据选取获得,http://www.digitalhimalaya.com/collections/nepalcensus/form.php?selection=1

③ 难以计算利米的准确人口主要因为:首先,许多利米人并未登记领取尼泊尔身份证,因此每次人口普查数据不完整;其次,利米人的流动性较大,不少家庭已经迁往加德满都定居,还有人移居至欧美发达国家,因此很难统计利米的具体人数。经过村庄领导、意见领袖的估算,世界范围内的利米人不少于 1500 人。

④ Melvyn C. Goldstein, “A Report on Limi Panchayat, Humla District, Karnali zone”, *Contributions to Nepalese Studies*, vol. 2, no. 2, 1975, pp. 89–101.

⑤ Melvyn C. Goldstein, “Tibetan Speaking Agro-pastoralists of Limi: A cultural Ecological Overview of High Atitude Adaptation in the Northwest Himalaya”, *Objets et Mondes*, vol. 14, no. 4, 1974, pp. 259–268.

⑥ Melvyn C. Goldstein, “When Brothers Share a Wife: Among Tibetans, The Good Life Relegates Many Women to Spinsterhood”, *Natural History*, March 1987, pp. 39–48.

⑦ Melvyn C. Goldstein, “Fraternal Polyandry and Fertility in a High Himalayan Valley in Northwest Nepal”, *Human Ecology*, vol. 4, no. 3, 1976, pp. 223–233.

⑧ Martin Saxer,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Trans-Himalayan Trade and the Second Life of Development in Upper Humla”,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vol. 2, no. 2, 2013, pp. 424–446.

⑨ Astrid Hovden, “Between Village and Monastery: A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a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 in North-western Nepal”, Ph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Oslo, 2016.

⑩ Astrid Hovden, “Who Were the Sponsors? Reflections on Recruitment and Ritual Economy in Three Himalayan Village Monasteries”, in C. Ramble, P. Schwiager, and A. Travers, *Tibetans Who Escaped the Historian’s Net: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ibetan Societies*,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2013, pp. 209–230.

⑪ Emily T. Yeh, “The Land Belonged to Nepal but the People Belonged to Tibet: Overlapping Sovereignities and Mobility in the Limi Valley Borderland”, *Geopolitics*, Published online: 19 Jun 2019, pp. 919–945, 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19.1628018

⑫ H. Diemberger and S. Skriver, “Piles of Plastic on Darkening Himalayan Peaks: Changing Cosmopolitics of ‘Pollution’ in Limi, Western Nepal”, *Worldwide Wast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ol. 4, no. 1, 2021, https://DOI: 10.5334/wwj.62

⑬ Tara Bate, “Domesticating Women, Animals, the Environment, and Spiritual Entities: Navigating Boundaries in the Pastoral Community of Limi, Nepal”, *Religions*, vol. 13, no. 6, 2022, https://doi.org/10.3390/rel13060495

适应性生存的研究译介到国内,成为我国学术期刊第一篇介绍利米人的论文。<sup>①</sup>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对包括利米人在内的喜马拉雅少数民族有所涉及。<sup>②</sup>总之,我国学界缺乏针对利米人的专门性研究。

本文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通过2017年至2020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地区(Boudhanath area)的利米社区、2021年8月至9月与2022年8月在我国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实地调查,<sup>③</sup>探讨尼泊尔利米人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与现状,讲述利米人参与中尼边境贸易活动及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故事。

## 一、历史与身份:谁是利米人?

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很少有关于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利米村庄的记载。但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该地区应属于象雄部落活动区。

7世纪后,松赞干布征服象雄,普兰被纳入吐蕃治下,属上东岱;9世纪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杀,吐蕃内部出现纷争,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朗达玛的曾孙吉德尼玛衮被迫逃至阿里,在普兰嘎尔冻建立阿里王系。<sup>④</sup>

在历史上,由于阿里地区及周边地带部落众多,王系更迭频繁,利米的历史归属错综复杂。10—12世纪,阿里地区在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经历了由局部统一向条块分割的演变过程,即由统一的阿里王朝逐渐分化成古格、拉达克、普兰三个同源分立的地方政权。<sup>⑤</sup>根据《阿里王统记》记载,11世纪初,普兰王纳卡德之子赞曲德建立了小王国亚孜王朝(又译为亚泽王朝)。亚孜王朝是从普兰王朝分离出来的,尼泊尔文献称之为“卡萨王朝”(Khasa kingdom),它统治了现在的尼泊尔西北地区。<sup>⑥</sup>该政权也是阿里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两个王系的谱系和管辖范围较为复杂,可以推测的是,利米在该时期处于普兰和亚孜两个王系共管、兼管或分管的状况。

自13世纪起,利米人向谷地周围各个王系缴纳“土地税”,直到亚孜王朝逐渐走向没落,并最终被“久姆拉”(Jumla)王朝取代。<sup>⑦</sup>阿斯特里德·霍夫登在利米谷地的寺院中找到了久姆拉克拉克卡拉(Kracalla)国王在利米谷地捐赠土地、建立喇嘛庄园的历史记载,<sup>⑧</sup>也佐证了历史上利米与久姆拉王系产生过关联。17世纪,古格王国覆灭。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阿里建立噶本机构,设立普兰宗,隶属阿里噶本管辖。<sup>⑨</sup>利米村民继而向普兰宗缴纳“人头税”,每年26.5卢比。<sup>⑩</sup>甚至也有利

① (美)戈尔斯坦著,坚赞才旦译《利米半农半牧的藏族族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王启龙、赵勇《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载《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沈海梅:《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8期。

③ 笔者于2017年2月、8月,2018年6月、12月,2019年3月,2020年2—5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地区进行了为期220余天历时性的田野调查,其中以“利米的社会生活状况”为主题对从利米谷地迁移至加德满都的利米社区领导人、大学生、生意人、家庭妇女、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僧人及季节性往返加德满都探亲访友的利米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此外,2021年8月30日至9月13日,笔者在我国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边贸市场以“利米人的边贸生活”为主题对新冠疫情期间滞留普兰的利米商人、务工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于2022年8月对普兰县新唐嘎边贸市场利米商人进行回访。

④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普兰县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⑤ 黄博《三围分立:11世纪前后阿里王朝的政治格局与政权分化》,载《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

⑥ 达瓦次仁《亚孜历史考》,载《中国藏学》2015年第4期。

⑦ 亚孜王朝的历史及谱系较为复杂,参见达瓦次仁《亚孜历史考》,载《中国藏学》2015年第4期。

⑧ Astrid Hovden, “Who Were the Sponsors? Reflections on Recruitment and Ritual Economy in Three Himalayan Village Monasteries”, in C. Ramble, P. Schwiager, and A. Travers, *Tibetans Who Escaped the Historian's Net: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ibetan Societies*,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2013, pp. 209–230.

⑨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普兰县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⑩ 杨公素《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载《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内部刊物》,1985年,第117—118页。

米人参与到普兰宗的行政事务管理中。<sup>①</sup>

1856年藏尼战争后,尼泊尔政府开始干涉利米事务,后来逐渐形成尼、藏共管的局面。在西藏解放前十年,西藏地方政府曾与尼泊尔政府交涉,双方承认利米的居民是藏人,应向西藏交税,但该地方则属于尼泊尔的领土。<sup>②</su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与尼泊尔建交后,两国于1961年10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正式确定两国边界,利米划归尼泊尔管理。<sup>③</sup>

至此,利米结束了既向西藏普兰地方缴纳“人头税”,也向尼泊尔缴纳“土地税”的历史。虽然在国家归属上已属尼泊尔,但利米人一直处于尼泊尔社会的边缘地带,政治身份依然模糊。20世纪70年代后期,尼泊尔政府推出“纳格里克塔”(Nagrikta)计划,向喜马拉雅地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数十万居民——如夏尔巴人、塔芒人等提供公民身份,利米人也包括在内。“纳格里克塔”就是指通过这项计划获得尼泊尔公民身份的人。自那时起,利米人在政治身份上才真正归属于尼泊尔,被纳入尼泊尔的国家行政管理范畴中。虽然如此,由于早期“纳格里克塔”计划制定和实施的随意性,在边境地区群体民族成分的认定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识别系统,因此利米人在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及标识方面没有达成共识,一些利米人选择了塔芒(Tamang),一些人选择了喇嘛(Lama)。在访谈中,许多利米人并不认可身份证上的民族归属,有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利米”,有人则认为自己是藏人(Tibetan)。

除此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尼泊尔公民身份对于利米人并不是那么重要。虽然根据《尼泊尔公民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的利米人可以通过合法程序获得尼泊尔的公民身份,但是许多利米人对办理居民身份证表现得比较被动和消极。一是身份证在封闭的村庄里作用和功能十分有限,二是身份证只能在胡木拉区首府西米科特(Simikot)办理,由于没有公路,从利米谷地步行前往西米科特需要四天时间,路途遥远。因此,大多数利米人只在办理到中国普兰所需的边民证,或在办理出国护照的情况下,才会前往西米科特办理身份证,这导致许多利米人长期处于“无身份”的状态。<sup>④</sup>

## 二、游离于边缘:利米村庄的自治与困境

利米人在尼泊尔的边缘地位,不仅体现在其偏远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上,在尼泊尔社会生活中亦是如此。由于冬季大雪封山,利米与尼泊尔其他地区有近半年时间几乎断绝了地理上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尼泊尔的国家行政权力很难覆盖至这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偏远山区。这一现实,一方面使利米村庄生成了独特的内部自治管理体系,另一方面也导致利米谷地在政策和经济方面获得政府的支持很少,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缓慢乏力。

### (一) 尼泊尔的村庄治理

长期以来,尼泊尔政府对利米的治理呈现出“若即若离”的状态。自20世纪60年代起,尼泊尔引入印度教社会的“潘查亚特”制度<sup>⑤</sup>后,这一制度也被推行到利米谷地。但在这一新的制度下,利

<sup>①</sup> 在尼泊尔的田野调查中,年轻的利米人BB曾向笔者诉说自己的祖辈曾为普兰宗的地方官员,并展示了其流传下来的官服,官服颜色为金黄色,上面刺绣着龙、凤等纹案。为遵循研究中的伦理道德,本文所有访谈对象的姓名以匿名化处理。

<sup>②</sup> 杨公素《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载《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内部刊物》,1985年,第117—118页。

<sup>③</sup> 杨公素《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载《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内部刊物》,1985年,第119—121页。

<sup>④</sup> 在调研中遇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拥有身份证是办理边民证的前提,因此许多利米人办理尼泊尔身份证的主要目的是办理边民证,从而获得前往我国阿里地区普兰县经商、务工的“合法身份”。因此,许多利米人在来普兰之前,都处于无身份证的状态。

<sup>⑤</sup> “潘查亚特”原是印度教社会一种传统的五老会制度,即每个自然村中由五位最年长的男子组成议事机构“潘查”(Pancha)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地方公务,如兴建学校和医院、筑池修路,以及裁决小的诉讼、协商解决村民纠纷等问题。参见王艳芬:《论尼泊尔“潘查亚特”体制实行的历史背景》,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王艳芬:《论尼泊尔潘查亚特制的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

米谷地仍然延续传统,实行世袭领导制。20世纪末,“潘查亚特”制度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尼泊尔村庄基层行政治理部门的乡村发展委员会(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利米村庄实行民主投票选举领导的制度,村庄领导人通常以80%以上的多票数当选,成为尼泊尔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全权负责村庄一切行政事务。到了2017年,村庄发展委员会又被“甘帕利卡”制度(Gaunpalika)<sup>①</sup>取代。

由于尼泊尔经济落后,国内发展常依赖国外援助。因此,无论是上述何种村庄治理形式和基层行政部门,对偏远山区的实质性行政治理都十分薄弱。尼泊尔政府的作用往往仅限于征收土地税等。对于利米的发展,尼泊尔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甚至很少有相应的经费投入和项目支持。因此,利米谷地的开发主要依靠当地人自行承担。

在此情况下,利米的传统文化、日常生活较少受尼泊尔主流文化的影响,尼泊尔政府对其日常事务也很少干涉,导致利米谷地和尼泊尔政府的关系较为松散,利米谷地与尼泊尔主要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呈现出较大的贫富差距。

## (二) 内部的自治管理

在村庄的日常管理上,利米以自治为主要形式,内部已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实施方法和运作规则。首先,村庄的管理与生活都以寺庙为中心,围绕宗教活动展开。在利米谷地,三个村庄的村民都信奉藏传佛教的直贡噶举派。在最大的村庄瓦尔则(Waltse),有一座仁青岭寺(Rinchenling Monastery),它是利米谷地的宗教中心,也是尼泊尔西部最古老的藏传佛教寺庙之一,<sup>②</sup>目前共有35名僧人。该寺原属萨迦派,直到15世纪才改宗直贡噶举派。宗教在利米村庄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僧人在村庄生活中拥有最高的权威。

利米谷地的土地归寺庙所有,通过土地这一媒介,利米人与寺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按照旧俗,寺庙将土地租赁给利米各家族,并从中收取一定的土地租赁费用。村规民约都是围绕着寺庙禁忌而制定的,明确规定村民是寺庙最大的施主。在主要的藏历节日中,利米人的新年与普兰藏历新年同日,村民们都会到寺庙中开展相关的仪式活动。寺院规定,每家的第二个儿子(或第三个儿子)在八岁的时候,要到寺庙里出家修行。所有的村民均有义务参加赞助和供养寺庙的宗教活动,向寺庙奉上酥油、粮食等供养物品。供养的数量依据村庄旧俗的身份等级和威望而定。<sup>③</sup>身份等级高的利米人需要捐赠更多的物品,地位低的则反之。这些旧俗已经成了村民们的共识。<sup>④</sup>寺院与村民之间的互惠关系是复杂的,为了回报村民的支持,仁青岭寺举行各种仪式,为村民们积累功德。当村民在健康、经商、农作等方面遇到问题时,僧人也会打卦并给予建议。在调研中,利米人BM不知为何背部长满了疹子,红肿瘙痒,他分别去看了西医和藏医,内服外用均无济于事,最后在寻求村子的僧人帮忙念经后得以痊愈。在他看来,这有赖于他长期给村庄寺院供养的功德。

其次,利米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利米谷地为规范和约束村民行为,通过利米乡村发展委员会形

<sup>①</sup> 尼泊尔最新设立的农村自治行政机构,将合并或拆分以往的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方式进行管理。

<sup>②</sup> 这座寺庙是我国阿里地区冈仁波齐山脚下江扎寺的子寺,是我国西藏大译师仁钦桑布(958—1055)在10世纪建立的。在寺庙外的泥墙上,村民们将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也成了利米村民为之骄傲的事情。据传是先有佛,后有寺。在瓦尔则,先建成一座两层楼高的大日如来佛像,然后才修建了一座寺庙。具体寺庙历史沿革参见 Astrid Hovden, “Who Were the Sponsors? Reflections on Recruitment and Ritual Economy in Three Himalayan Village Monasteries”, in C. Ramble, P. Schwieger, and A. Travers, *Tibetans Who Escaped the Historian's Net: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ibetan Societies*,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2013, pp. 209–230.

<sup>③</sup> 具体的社会阶层划分参见(美)戈尔斯坦著,肇赞才旦译《利米半农半牧的藏语族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sup>④</sup> 虽然利米现在不再强调身份等级,声称人人平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一些细微和心理上的差别。据访谈对象BM所说,一个不懂事的年轻人曾经在年长的村民中提及自己的贵族身份,从而遭到其他人的打骂。

成了一套社区治理的实践和规则,其内容涉及农业、宗教、村庄集体活动等方面。例如,瓦尔则村规定,大小户主由年满16周岁的男子担任,户主必须参与寺院和村庄的集体劳动,出席村民大会和临时性会议。如若缺席,将被处以每次1000卢比(折合人民币约60元)的罚款。<sup>①</sup>这在尼泊尔算是一笔不菲的款项,严苛的规定被村民们认为是保护村庄文化传统、增加凝聚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日渐频繁的集体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将利米年轻人禁锢在村庄的枷锁。虽然许多年轻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面对严苛的传统村规却无计可施。在调查中,一位年满16周岁的利米年轻人幸运地获得了欧洲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但由于村规的约束,最后不得不放弃。<sup>②</sup>

随着时代的变迁,臧和涕尔两个村庄逐渐摆脱了旧俗。近年来,村民们频频召开会议,通过了同意自愿放弃村庄土地、迁移到城市的决定。在这两个村庄中,许多利米人卖掉了家里的牲畜,迁居首都加德满都,在博达哈地区购买土地,或是以加德满都为中转地通过非法的途径迁移到欧美等发达国家。<sup>③</sup>虽然在名义上离开村庄,但村民每年仍需向寺庙奉献供养。

### (三) 发展的困境

尼泊尔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薄弱,处于尼泊尔社会边缘的利米村庄更是面临这一问题的困扰。

首先,从利米人的内部看,自给自足型的农业与畜牧业作为传统生计手段难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在农业方面,利米谷地中有一条河流穿过,水量充足,适合灌溉耕种。村民们主要种植大麦、青稞、土豆、青椒、西兰花、白菜和洋葱等农作物。这些粮食基本满足利米人一年的日常需求,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剩余的麦子和青稞,成为利米人制酒的基础材料。在畜牧业方面,利米人主要饲养牦牛、绵羊和马,放牧地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迁移。在历史上,利米人春天、夏天及秋天在利米谷地放牧,到了冬天,便转移到我国阿里地区洛大林、扎沟草场等地。两国的边界确定后,我国与尼泊尔政府多次签订关于边民过牧的协议,同意过牧地区应是可进入的和方便的、距边境点24公里以内传统上用来过牧的地区。<sup>④</sup>这使利米人能在冬天保持过牧的传统,为其提供便利。但总的来说,利米人的生计模式较为传统和单一的,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收益难以满足基本的温饱所需。2010年,利米山谷所在的胡姆拉被尼泊尔粮食安全监测系统认定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地区,75%的居民被归类为“粮食极度不安全”。<sup>⑤</sup>2021年冬天,尼泊尔媒体报道了一群利米人因粮食短缺,被迫徒步到首都加德满都,要求尼泊尔政府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新闻。<sup>⑥</sup>

其次,在外部因素上,由于利米人一直远离尼泊尔政府的管控,加之尼泊尔国力有限,导致利米一直处于国家发展规划的边缘,不受政府重视。也正因如此,利米人很难跨过重重障碍进入尼泊尔政府中担任官职,为谷地村庄争取更多的政策与福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前,作为一个边缘社区的利米,在更广泛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发言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利米谷地的发展。

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利米遇到另一个主要问题。曾在利米谷地小学任教三年的DJ说“实际上

① 为了加大惩罚力度,自2022年7月起,如若缺席村庄集体活动,罚款费用上涨至4000卢比。

② 这种情况在利米村庄十分普遍,一些年轻人为了遵守村规,不得不放弃在外求学的机会,回到村子里履行村规所要求的职责,因此,利米人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③ 利米人迁移至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南亚藏胞的情况大致相同,参见李志农、高云松、郭迪、和淑清《南亚藏胞的二次迁移及其在欧洲的现状调查研究》,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4期。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王国关于边民过牧协议的换文》,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双边关系重要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该协定在1962年签署,每5年换文延长,1989年终止。经尼方要求,双方又于1999年重签。

⑤ 详情参见尼泊尔粮食安全监测系统网站, <https://neksap.org.np/food-security-bulletins>

⑥ Amish Raj Mulmi, “The Nepali State in the Himalaya(EB/OL)”, *The Kathmandu Post*, <https://kathmandupost.com/columns/2021/12/09/the-nepali-state-in-the-himalaya>

尼泊尔政府每年均派两名老师到利米谷地任教,但是这些老师拿着12个月的工资,却只来学校2、3个月。”<sup>①</sup>利米乡村发展委员会向尼泊尔政府多次反映这一问题,但都没有得到回复。因此,许多利米年轻人自愿回到村庄里任教,他们的工资由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承担,每月12000卢比(折合人民币约600元)。由于缺乏教师,许多教学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在农业生产、文化教育、日常生活等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利米人司空见惯的。

近年来利米引起了一些西方人的注意,不少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流入利米村庄。此外,由于在利米的藏村能遥望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不少背包客和印度教徒来到利米谷地开展徒步和旅游观光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给利米人带来了一些收入。尽管如此,对于利米谷地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仅靠西方非政府组织及有限的观光客是远远不够的。

### 三、利米人的中尼边境贸易活动

历史上,喜马拉雅山脉南北的居民互动频繁、交往密切,民间贸易历史悠久。利米人与大部分边民一样,也是流动的商人。尤其是在物质短缺的时候,利米人不得不越过边境,来到我国西藏的普兰县进行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普兰县处于中、尼、印三国交界处,具有地理优势,是最佳的贸易集散地与转运点。“依边而生”成为利米人生存与发展的策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西藏的落地实施,边贸的潜力被激活,给利米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机会,利米人成为中尼边境贸易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 (一) 利米人传统的边贸互市

普兰县至今还流传着历史上中尼两国边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故事。据考证,早在上千年前,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部落族群就用羊驮着粮食来到普兰,与阿里北部牧区的居民交换自然盐,满足各自所需,逐渐形成了久负盛名的“盐羊古道”<sup>②</sup>。盐粮交换比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普兰边民互市贸易的盐粮交换比价在夏天为青稞与盐1:1、大米与盐1:2,春天为青稞与盐1:4—5、大米与盐1:8—9;秋天为青稞与盐1:2—3、大米与盐1:5—6。<sup>③</sup>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正式在普兰县设立“国际边贸市场”。在县城的东风桥边、孔雀河西北岸的山坡上,一条百余米的长街,两排简陋的房屋,即为国际边贸市场的旧址。随着贸易的发展,交换的物品越来越丰富,参与贸易的人数日益增多。每年七八月,边民们带着货物从四面八方赶来,利米人也活跃其中。他们从利米村庄步行32公里左右的山路,便能抵达普兰。一方面,他们通过肩扛马驮的方式,把小麦、荞麦、红米<sup>④</sup>等谷物运卖到普兰;另一方面,他们把阿里地区的盐带到尼泊尔海拔较低的地区。此外,利米人的贸易还包括木碗、羊毛、牛尾、麝香、木材、药用植物、香料以及各种制成品等。<sup>⑤</sup>边民们到九月就购买日用品回家。这些尼泊尔边民大多居住在普兰宗贤柏林寺下方达拉喀山山坡上的洞穴里,由于尼泊尔边民较多,这些山洞被当地人戏称为“尼泊尔大厦”。虽然目前旧唐嘎市场已经废弃,但还存留着边民互市、洞穴生活的痕迹。<sup>⑥</sup>

① 摘自对利米商人DJ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13日。

② 史金茹《“盐羊古道”新传》载《西藏日报》2020年7月30日,第2版。

③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志·海关志》,中国海关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④ 尼泊尔卡尔纳利省的胡木拉、久姆拉等地盛产的红米(Marsi)在早期是边贸的重要产品,利米人通常将购得的红米运卖到普兰县。在调查中,许多普兰人对利米人售卖的红米仍然记忆犹新。

⑤ Martin Saxer,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Trans-Himalayan Trade and the Second Life of Development in Upper Humla”,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vol. 2, no. 2, 2013, pp. 424–426.

⑥ 对于这些洞穴的来历说法不一,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些洞穴大多已经废弃,无人居住,但一些利米人称依然会有贫困的尼泊尔人偶尔居住其中。

利米人 ZB 依然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越过边境在普兰以货易货的场景。当时,用传统的孔雀服饰可以换到 45—50 公斤粮食,一个做工精美的木碗可以换得 4000 卢比。中尼边民边贸往来频繁,交换的物品具有互补性,因此也将两地边民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 20 世纪除了参与边境贸易活动,一些利米人也在普兰从事一些季节性的工作。女性主要编织地毯、制作服装;男性则多在建筑工地打工。普兰为利米人提供了新的生计手段和谋生资源,也改变了利米村庄单一的收入结构。

### (二) 木碗的制作与销售

在利米人销售的货物中,木碗占绝大多数,成了利米的标签。利米人擅长制作木碗,制碗是利米的一项传统手艺。他们所制作的木碗因做工精细,质量上乘,在西藏享有盛誉。戈尔斯坦在 1974 年对利米的调研中就对他们的制碗技术给予高度评价。<sup>①</sup>早期,利米人在利米谷地砍伐枫树用以制作木碗,基本能满足自用和边贸以物易物的需求。随着木碗的影响力和销售量的增大,利米谷地的枫树被砍伐殆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利米人开始从尼泊尔其他地区和印度的喜马拉雅邦和北方邦砍伐木头。<sup>②</sup>随着林业保护法律的设立,伐木成为一项具有风险的职业,一般需要依靠贿赂或其他非法手段,有时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及监禁。因此,利米人一般会选择在每年寒冷的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前往印度喜马拉雅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sup>③</sup>采伐木头,以此躲避检查。木头的砍伐与运输日益隐蔽,木头通常在砍伐后被秘密运输至加德满都或胡木拉的木材加工厂,在那里通过手工整形、磨光。<sup>④</sup>

进入 21 世纪后,一些利米人把木碗制作工厂搬到了普兰,人们还能够在普兰边贸市场看到利米人现场制作木碗的景象。现在利米人很少制作木碗了,就连利米人所销售的木碗都并非出自利米人之手。目前,木头的砍伐及偷渡,再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和胡木拉地下工厂的加工制作和销售,都已经成为胡木拉人的工作。木碗大多用机器制作,与以往利米人手工制作的木碗相比,整体的品质已经严重下降。用利米年轻人 DZ 的话来说“可能是跨国的木碗生意让利米人更富有,胡木拉人的工价比较便宜,所以利米人向胡木拉人支付工资,一些冒险和辛苦的活儿就转移到了他们的手上了。”<sup>⑤</sup>

### (三) 当今利米人的边贸生活

随着来普兰务工的尼泊尔人越来越多,我国对尼泊尔边民的管理也日益规范。自 2002 年起,中尼两国重新签订了通商协定,规定边境居民凡因进行包括边民互市和小额贸易在内的贸易活动或探望亲友前往对方边境地区,须持由相关部门颁发的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入境后只能在边境 30 公里内活动。<sup>⑥</sup>因此,边民证成为利米人合法进入我国边境地区的身份证明。

2003 年,普兰县在新县城修建了新的边贸市场,挂着“中国西藏普兰边贸市场”牌子,共有 59 间门面,分为印度商贸区与尼泊尔商贸区,并于 2006 年扩建。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时期,西藏大部分的边贸市场均已关停,普兰边贸市场依然有序地在运营。利米人承租的店铺是普兰吉让居委会筹资建设的土木结构平房,位于边贸市场旁。市场共有三条街道,呈“H”形。这里是利米人集中

① (美)戈尔斯坦著,坚赞才旦译《利米半农半牧的藏族族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美)戈尔斯坦著,坚赞才旦译《利米半农半牧的藏族族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木头的砍伐与运输也得益于尼泊尔与印度之间的边境开放政策。

④ 在普兰的调研中,许多利米人都讲述了 20 世纪利米人越境砍伐木头惊心动魄的故事。

⑤ 摘自对利米商人 DZ 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协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双边关系重要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第 196 页。该协定 1956 年 9 月 20 日签订,1966 年重订、1976 年换文延长、1986 年修订签署、2002 年修订签署并将边民证纳入协定中。



开展贸易和日常生活的区域。边贸市场虽从外观上看较为简陋,但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除店铺外,市场还设有茶馆、餐饮、娱乐等配套服务设施。

在新冠疫情之前,在普兰边贸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固定外商有400余户,尼泊尔籍、印度籍的从业人员多达上千人,整体贸易规模较大、边民跨境流动人数较多。目前,有近150位尼泊尔边民留在普兰,其中利米人84人,约占总人数的1/2。共有20多家利米人开设的店铺正常营业。店铺大小和条件不同,店铺的租金也略有差异。利米人普遍每年花费3200—5000元就能租到一间5—10平方米的商铺,其经营的商品富有尼泊尔特色,木碗依然是利米人主要销售且最为畅销的商品,此外还销售瑞士名表<sup>①</sup>、香水、服装、手工木雕、佛珠、天珠、玛瑙以及绿松石等。中尼两国之间的跨国物流并没有因疫情而中断,木碗等货物依靠中国邮政及申通等快递公司从尼泊尔运到普兰。

每天络绎不绝的朝圣者、背包客慕名来到这个小型边贸市场。利米人早早地开门营业,把店铺里里外外清扫一遍。中午时分是市场最热闹的时候,讨价还价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利米人所经营的餐馆里,常常传来尼泊尔咖喱饭的香味,也不时能听到休闲的人们玩藏骰的叫喊声,给这个市场增添了不少生活气息。

长期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利米人意识到网上销售的重要性。他们逐渐转变了思维,运用互联网的资源来促成生意。DJ便是其中之一,在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打开抖音,拍摄一些短视频介绍自己的木碗,或是跳上一段尼泊尔的传统舞蹈发布在网络上。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得到了许多藏族网友的关注,纷纷给他点赞,并成交了许多订单。“三个月前,我进货了1000个木碗,我现在只剩下了250个。”<sup>②</sup>在2021年,一个普通的木碗售价在300—500元间,可想而知,这给DJ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益。每周他会花两个下午的时间来到普兰县邮局,给素昧平生的顾客邮寄货物。

对于利米人而言,普兰县充满了资源与机会。除了做生意外,务工也是利米人的生计手段之一,利米年轻人主要做建筑工人、超市货物装卸工、餐厅服务员、酒店的保洁等工作。YZ在宾馆做前台和服务员的工作,在与客人的日常接触中她掌握了基础的汉语,每月能获得4000元的薪金。“这样的月薪在尼泊尔是不敢想象的,我很热爱这份工作”。<sup>③</sup>作为建筑工人,BB主要负责扛水泥和砖头,日薪是250元,“如果在尼泊尔,这可能要努力一周才能赚到”。他很自豪地介绍着曾参与过的一些中国政府地方工程项目,“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对于赚钱是非常好的”。<sup>④</sup>

对于利米人来说,来普兰县工作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高额的收入,他们普遍对在普兰的生活感到满足,也越来越热爱和享受“依边而生”的生活状态。他们从中获得了众多的生计资源,参与的工作种类也越来越多样,收入也急剧增加。在普兰县的大街小巷上随时可以看到利米人的身影。在人群中,很难看出利米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区别。

#### 四、利米人的边贸生活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日趋频繁的边贸活动、人文往来,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政策的推动下,中尼两国边民形成了友好积极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边境线带来的时空阻隔,拉近了在双方文化心理上的距离,并以经济、文化等为纽带,逐渐形成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利米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我国“兴边富民”政策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

<sup>①</sup> 瑞士名表主要为梅花表(Titoni)、瓦斯针(West end)等品牌,进货于加德满都王宫前杜巴大道(Durbar Marg)的名表店,再通过物流运至普兰。由于手表的价格比专柜便宜,因此有一定的市场,瓦斯针出品的藏文表盘的定制款手表深受藏族人民青睐。

<sup>②</sup> 摘自对利米商人DJ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13日。

<sup>③</sup>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YZ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5日。

<sup>④</sup>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BB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10日。

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和传播者,不仅使利米村庄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 (一) 道路的互联互通

普兰长期以来是阿里地区通往印度次大陆的关键要道,共有21条对外通道。经过从传统商道、边境通道到边贸互市的发展变迁,跨国通道成了维系两地人员往来及经贸交流的纽带,在边民积极参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道路畅通是边民跨境交往交流的前提。由于受到中印边境冲突的影响,以及季节性气候变化(如冬季大雪封山、夏季雨水毁路等)制约,道路的通达性曾受到影响,甚至一度中断,但并没有影响利米人越过边境开展贸易活动。

由于地理位置的相邻,普兰能够满足利米村庄日常所需的供给。道路的互联互通也给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目前,在正常情况下从利米谷地步行至我国的普兰口岸只需要一天的时间。此外,在玛旁雍错旁的拉则拉山口(Lapche La pass)有一条土路可以连接利米的臧村,这条原来的商队路线也逐渐发展成了机动道路。在地方政府的许可和协助下,利米人把从普兰购买的货物通过公路运送到利米的臧村,之后村民再通过牦牛、马将货物运送到其他两个村庄。为了方便运输,村庄购置了四辆东风牌卡车和三辆皮卡车,均为中国牌照,用于日常的货物运输。陆路货运一方面提高了道路的使用率,另一方面也大大缩短了运输的距离,节约了时间成本。

BM依然记得小时候自己的父亲常常往返于普兰与利米之间,每次父亲都会给她带回许多中国的娃哈哈酸奶,这成为她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中国商品在利米村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弥补了尼泊尔边境地区交通落后导致的边民生活物资缺乏的短缺。CR介绍道“利米村庄里小卖部的大多数货物都来自中国,里面销售着许多中国商品,包括酥油、大米、拉萨啤酒等食品,这些都是从普兰运输过来的。”<sup>①</sup>BM认为,“因为我们村子没有公路通往尼泊尔的任何城市,但我们这边有路可以通往中国普兰,虽然是土路,但是在我看来已经是一条非常畅通的路了。相比尼泊尔<sup>②</sup>,我们更靠近中国,所以我们更依赖中国。因此,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我们就没有食物,我们就会死去”<sup>③</sup>。

道路对于利米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道路的互联互通不仅加强了边境地区跨境边民间的交往交流,更是偏远地区边民赖以生存的生命之路。

### (二) 经济的互惠共济

大多数利米人一年中有六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在普兰生活。他们常常说,村庄里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人在普兰经商或务工。许多在加德满都的利米人都十分羡慕在普兰的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不仅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是他们在加德满都工资的数倍,而且工作更有前景。许多利米年轻人将来到普兰经商、工作纳入人生规划中,并对此抱有期待。利米人已经习惯并适应了跨境的边贸生活,以此作为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

普兰是我国重要的边境城市,历史悠久的边境贸易使其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及转运点。随着我国“兴边富民”政策在普兰落地,普兰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商业、餐饮、旅游业及其他服务业因此快速发展起来,边贸市场的潜力由此被激活。

边境贸易成为边境地区民众互惠共济的桥梁。作为普兰边贸市场重要的参与主体,利米人所

<sup>①</sup>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CR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3日。

<sup>②</sup> 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与利米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去加德满都说成去尼泊尔,这出于他们的日常谈话中的习惯。

<sup>③</sup>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BM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8月30日。

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传统上就有的经商意识,驱使他们将各种商品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带到普兰地区,影响和推动本地农牧民参与市场经营,为搞活市场提供了动力,市场的潜力也在无形中得到了扩展,进一步扩大了边民经济生活的交往互动。

利米与普兰在文化和地理上的密切联系,为双边经济往来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源泉。我国对尼、印边民商户的边民政策、优惠政策和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带动利米人主动融入和开展与我国的经贸活动。从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传统交易,到现在的多元化交易,普兰逐渐成了充满活力的经贸区,提高了两国边民的生活水平。

### (三) 文化的交流共进

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尼泊尔利米谷地与我国普兰县在文化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虽然在边界划定后两地居民分属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但由于地理区位的偏远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利米并没有受到多少尼泊尔主流文化的影响,其传统文化依旧保持完好。虽然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边境线,但利米与普兰县的藏族在语言、习俗、宗教、服饰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为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交流奠定了人文基础。

共同的语言是文化沟通交流成为可能的前提。利米人普遍讲藏语普兰方言,一些年轻人还会说一些印地语、尼泊尔语和英语。然而在边贸活动中,随着越来越多内地游客的到来,汉语也成为利米人学习掌握的热门语言。在普兰做生意的利米人,大多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年轻人在边贸实践中都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在来普兰之前,LS在加德满都博达哈地区学习了一个月的初级汉语,一些利米生意人在遇到交流问题时,总是会请他来帮忙翻译,他也为拥有汉语听说能力感到自豪。LS强调掌握汉语的重要性:“如果我会说汉语,在普兰,我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尤其是来普兰旅游的游客,把生意做大做好,就连我回到尼泊尔后,也可以在加德满都找到好的工作。”<sup>①</sup>由此可见,汉语成了一种生存技能与文化资本,在利米人的日常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利米民间,也有一些人积极尝试开展与我国人文交流活动。2018年夏天,利米谷地的两位年轻教师DJ和NZ组织了15名利米儿童来到普兰县开展夏令营活动。<sup>②</sup>许多利米孩子与在普兰做生意的家人见面,并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了马路、高楼和机动车,教师DJ称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通过此次活动,利米小孩走出了封闭的村庄,对中国的发展有了直观的认识。在加德满都,我们遇到了利米年轻人SN,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他,是利米唯一一名在中国留过学的大学生。据他所说,他的父亲长期在普兰做生意,耳闻目睹中国的发展,因此极力建议他到中国留学。SN在2015年获得了中国的留学生奖学金,就读于江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四年的大学生活,他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学习了中国的文化。<sup>③</sup>也正因为这一段留学经历,SN在2020年被选为新一届利米青年协会的会长。

就目前来看,利米人在与我国的人文交流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形式和渠道都比较单一。无论是国家主导还是民间推动,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深化和拓宽人文交流的渠道和途径,增进彼此的认识与信任,促进区域经贸和文化的共同繁荣已成为双方边民的

<sup>①</sup>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LS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8日。

<sup>②</sup> 根据尼泊尔法律规定,年满16岁的少年才能办理尼泊尔身份证,也由此才能办理边民证。教师花了4天时间步行至首府西米科特进行担保,拿着出境儿童的名单,带领小孩步行了一天来到我国的普兰口岸。根据带队老师回忆,当时口岸已经下班,但是在与值班人员沟通说明了情况后,得到了放行。此外,利米儿童的到来也得到了普兰地方相关部门的欢迎。

<sup>③</sup> 摘自对利米大学生SN的访谈,访谈地点: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区,时间:2020年4月20日。

共识。

#### (四) 命运的患难与共

对于利米人而言,边贸活动不仅成为他们重要生计来源,也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与中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公平安全的贸易环境给利米人带来了安全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普兰县安排了专门的警察维护边贸市场的治安,保障边民的人身安全。“这边的治安很好,警察也很负责,不像在尼泊尔一样总是很担心遇到危险,警察永远不站在我们这边,甚至会腐败,问我们索取贿赂,让我感到紧张。”<sup>①</sup>

利米人时刻能感受到来自中国普兰地方政府的人文关怀。“这边的公务员对我们很好,这是我很喜欢的。”利米人普遍感激中国,除了在日常生活的帮助外,普兰县政府还会向贫困的人提供援助,例如赠送大米、蔬菜和衣物等。“这边的政府非常关心我们,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肾病,政府立刻安排车送她到地区医院看病。”<sup>②</sup>

相互帮扶、患难与共是“命运共同体”重要的理念,尤其是在面对人类共同灾难的时候,患难真情则更能得到体现和诠释。2021年,普兰县人民医院为所有滞留的利米人完成了两针疫苗的免费接种,“这里非常安全,当疫情发生的时候,普兰这边的人十分照顾我们,也定期来给我们测量体温,做健康检查,免费给我们做核酸检测”<sup>③</sup>。许多利米人都在抖音和微信朋友圈晒出了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

## 五、结 语

在尼泊尔的调研中,当问及利米人关于利米未来发展问题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中国会帮助我们”<sup>④</sup>。事实上,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频繁紧密的交往与互动,不仅加深了利米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信任,也使利米的命运与普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目前,我国党和政府的政策给边境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给边贸活动注入了动力和活力。2022年7月1日,普兰县新唐嘎边贸市场落成营业,总占地面积为62680平方米,分为自贸区、边贸区和酒店式公寓区,硬件设施完善、功能齐全。<sup>⑤</sup>利米人告别了低矮破旧的土平房,取而代之的是崭新明亮的店铺和豪华便利的公寓高楼。在我们的回访中,利米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纷纷感叹不仅住上了配备电梯的楼房,还享受了中国政府对于租赁的优惠和分期付款的利民政策。<sup>⑥</sup>可以说,利米人边贸生活的案例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sup>⑦</sup>。

在利米人赖以生存的边贸活动中,利米人不仅享受到我国“兴边富民”的成果,辐射带动了利米村庄的发展和利米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促进了区域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使利米人多层次、多形态、主动地参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指出,中尼边贸存在活力不足、边境地区人文交流的形式和渠道较为单一、边民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周边命运共同体缺乏全面认

①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 CR 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3日。

②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 BM 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8月30日。

③ 摘自对利米务工人员 LS 的访谈,访谈地点:西藏普兰边贸市场内,时间:2021年9月8日。

④ 摘自对利米大学生 TL 的访谈,访谈地点: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区,时间:2020年3月8日。

⑤ 新唐嘎边贸市场的边贸区共有商铺217间,内贸区商铺105间,酒店式公寓区172间。

⑥ 目前,边贸市场的租房优惠政策为店铺每月每平方米的租金为18元,租期五年,前三年免费。公寓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5元,租期五年,第一年免费。

⑦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

识等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边贸实践的拓展和深化。因此,还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边贸活动政策和制度,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营造良好的边贸环境;扩大边境地区人文交流的渠道和形式,满足边民发展生产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加大边贸延伸的产业联动、促进旅游、运输、餐饮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增强中、尼、印边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度、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度和参与度,这对开展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扩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增强彼此的了解、互信和友谊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利米人的边境贸易活动不仅是我国西藏边贸繁荣发展的写照和缩影,也是西藏构建面向南亚开放通道的典型案例和发展成果。在我国日益加大“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及“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与落地的同时,利米人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充满着美好期许。

**Abstract** Nepal's Limi Valley borders Purang County, Ngari Prefectur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cross-border trade. The Limi people are of the same origin as the Tibetans in China, and the frequent change of the royal lineage in history made them complicated in the question of belonging. According to the "Boundary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signed in 1961, the Limi region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Nep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regions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pursued by China, the Limi people hav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ecom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BRI,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regions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and the promoters and contribu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ighborhood.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Limi people and their life on trade across the China-Nepal border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BRI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ighborhood.

(李志农,研究员; 邬迪,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昆明 650091)  
(责任编辑:于红)